

·文献学苑·

明代翻刻宋本出版兴盛的社会文化背景探析

杨 军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陕西西安 710062)

摘 要: 明代翻刻宋本之所以兴盛于嘉靖年间前后, 主要是由明初前代典籍出版稀缺, 产生古籍出版的社会需求; 古籍出版迎合文化复古的风潮; 学术研究与典籍整理的需要; 文人嗜书、藏书的习尚; 明政府严禁篡改旧版文字行格等五个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

关键词: 明代翻刻宋本 社会文化 图书出版

中图分类号: G25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8)01-0128-04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Woodblock in the Song Dynasty Books Reprinted in the Ming Dynasty

Yang Ju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Journa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 'an, Shanxi, 710062)

Abstract: There was a profound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with the booming of the woodblock of the Song Dynasty books reprinted in the Ming Dynasty. Because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in previous dynasties were scarcely published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refore social demands for ancient books arose; ideological trend of cultural returning to the ancients sprang up everywhere during Hongzhi and Zhengde's reign, so students claimed that they should read more ancient books; scholars' academic research and arranging of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also required ancient books; men of letters' habits of loving books and cherishing ancient books.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gave orders that any changes of the ancient books were strictly forbidden. These factors interacted on each other.

Key words: woodblock-reprinted books; social and cultural; publishing book

CLC number: G256.2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8)01-0128-04

明代嘉靖年间前后,出版业兴起一股翻刻宋本的热潮,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其影响波及晚清乃至民初的出版业。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对出版活动的内容、形式有制约作用;与之相辅相成,出版活动可谓社会文化的“晴雨表”,较为直接地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脉络。明代嘉靖年间前后翻刻宋本的兴盛,恰从出版方面为当时的社会文化特征做了一个绝好注脚。

一 明初前代典籍出版稀缺,产生古籍出版的社会需求

明代洪武初年以《四书》、《五经》取仕,士子只要谙熟朱子传注,即可取得科名,从此士子专事揣摩,束书不观。教育内容单一,学术思想被桎梏在狭小的圈子里。黄佐说:“成化以前,道术尚一,而天下无异习,士大夫视周、程、朱子之说如四体

然,惟恐伤之。”^[1]这种情形直接导致书籍出版囿于《四书》、《五经》、性理之类。坊间所见多为科举时文,古书鲜见。都穆的两篇跋文透露出相关信息:

古书自五经而外,若《左氏传》、《国策》等以及是书(指王充《潜夫论》),皆学者所当究心,而往往夺于举子业,好古之士虽未尝无,而坊肆所市,率皆时文小说,求如此本,岂可得哉!^[2]

汉黄门侍郎荀悦所著有《汉纪》及《申鉴》二书。《汉纪》余尝读之,而《申鉴》恨未之见,盖求之三十年而始得之。^[3]

以士子常备书《史记》为例,正德十二年,在号为“书籍渊藪”的建宁,《史记》的刊刻并不多见,以致建宁郡守张文麟检讨当时状况说:“近时刻书者,专事时文……以此媒利。至于古书,

多弃事不省。间有刻《史记》者,君子伟之。^[14]甚至嘉靖年间普通士人能读到正史全编亦非一件容易的事。《史要编》的编者梁梦龙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其《刻<史要编>叙》自述道:

余生北方,为诸生时,未尝睹全史。自入翰林作养,为给舍,至府丞,几十年,始获涉猎十之三。周流藩臬,又十年,到处借观,涉猎稍遍……既成,同志览之曰:全史罕睹,岂惟北方!

由此看来,前代典籍在明初的一百多年间流传甚稀,待到何景明、李梦阳等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士人热切地要求多读古书,这种社会需求推动了出版业翻刻宋本的热潮。

二 迎合文化复古的风潮

朱元璋建立政权后,即着手恢复汉民族文化传统,诏示天下:“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6]这种“复旧”——复兴古制——的权威倡导,与元明易代之际汉族士人压抑已久而勃发的振兴汉民族文化的历史责任感产生共鸣。明初的大批儒者均以“驾轶汉唐,锐复三代”^[6]为己任,视复古为兴邦的惟一有效途径,肇始于弘正间的文化复古运动即是明代复古思潮一次较为集中的呈现。

从史料来看,弘正时期,复古已成为当时一股文化大潮。李梦阳《答周子书》言:“弘治之间,古学遂兴。”^[7]杨慎《升庵诗话》引唐铎语曰:

弘治间,文明中天,古学焕日,艺苑则李怀麓、张沧洲为赤帜,而和之者多失于流易。山林则陈白沙、庄定山为白眉,而识者皆以为傍门。^[8]

成化、弘治间王铎所著的《寓圃杂记》中,也记载了这方面的信息:

吴中素号繁华……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赉赉两汉之域,下迨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气运使然,实由朝廷休养生息之恩也。^[9]

在《寓圃杂记》卷五的“苏学之盛”一则中,王铎还提及苏州“近年尤尚古文,非他郡可及。”这里虽说的是吴地情形,但吴地在明代经济繁盛、文化发达,苏州可谓明代社会风气的领跑者,而复古气象代表着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

至嘉靖时,这种“好古”之风,尤盛行于士大夫群体中,甚至影响到嘉靖皇帝。他听从大臣的建议,制定了秋季大享明堂之制、皇后亲蚕之仪、祀高谋之礼、圣师之祭等循古之制。许多士大夫刻意学古,如成化进士王鏊上书朝廷,建议求才“必以

通经学古为高”,^[10]弘治进士罗侨“敦行谊,动则古人”,^[11]嘉靖进士赵时春上书朝廷要“复古冠婚、丧祭之礼”。^[12]足见好古之习已风行于上层社会。

这种复古思潮反应在图书的典藏与刊刻上,即是收藏、刊刻古籍之风十分盛行。有关资料统计表明,宋元两代有藏书家仅百余家,而有明一代就有四百多家,且大多在成化以后出现的。藏书家以贮藏古书多寡相争胜,是士林“好古”风气的充分体现。翻刻宋本者多是官员、学者、藏书家,他们对朝野复古文化风气的把握最为敏锐,反应也最快,其好古的追求反映在刻书上,即大量翻刻宋代典籍,甚至刻意规仿宋槧,悉遵旧式,这种风气蜂起于经济发达、文化复古意味浓厚的吴中地区,至嘉靖时期而大盛,翻刻宋本成为此时出版的一大特色。从明代翻刻宋本多集中于嘉靖时期来看,古籍的出版与复古思潮如影随形、相伴而生。

三 学术研究与典籍整理的需要

明人对汉唐盛世的向往,使得他们对当时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投入极大的热情,汉唐诸多典籍在此时得到空前的重视。崔铣《漫记》中说:

弘治以前士攻举业,仕则精法律,勤职事,鲜有博览能文者,间有之,众皆慕悦,必得美除。自孝皇在位,朝政有常,优礼文臣,士奋然,兴高者模唐诗,袭韩文……弘治末,颇知习《左传》、《史记》矣。今日士著书则自谓周汉,摘词则自任风雅,然皆六朝余习。^[13]

复古风气表现于文坛,即是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他们意欲以推崇先秦、西汉的古文,与当时文坛盛行的空靡的台阁体相抗衡。于是,“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14]李梦阳主张“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15]因此,司马迁的《史记》受到格外推崇,成为文人为文的“发式”,从篇章、结构、修辞等方面刻意模拟,地位超过了《汉书》。凌稚隆辑校《史记评林》徐中行《序》云:

《史记》体裁既立,固因之而成书,不过稍变一二,诚易为力者耳。其时诸儒钻仰训诂,承为集解,至二十四家,而《史记》解释者少。历代之宗《汉书》,至宋尤为盛。其宗《史记》者,乃始盛于今日之百家,然二氏皆良史才,而其得失靡定者,盖各因时所尚而资之近者为言耳。^[16]

于是,《史记》的需求骤增,在现存的六十余种刻本中,明代刻本约占二分之一,^[17]著名的翻刻宋本——“嘉靖三刻”即

出现于此时。

同样,“诗必盛唐”的倡扬,使得从弘治初到隆庆末,诗坛弥漫着一股崇唐风气,也推动了明代唐诗研究的深入。研究唐诗需要文本,于是大量唐人诗集得以重刊,而其中不乏翻刻宋本唐集。如弘治九年李瀚、刘玘《韦苏州集》刻本、十一年韩明、李纪《刘随州文集》刻本、十二年杨一清、于睿《孟东野诗集》刻本等。总体上看,弘治年间重刻唐人别集数量不多,进入正德、尤其是嘉靖年间,唐诗的出版逐渐升温,并形成热潮。这期间翻刻宋本的数量占明代翻刻宋本的绝大多数。这从一方面说明,“前七子”兴起于弘治间,到正德间才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继之以“后七子”的倡导,嘉靖间唐人诗集的刊刻风潮已大盛。

正德以前,刊刻多为唐人行诗集;正德以后,汇集唐代多人诗集的丛刊业已出现。如正德刻本《唐人小集》五十八卷,收录34位作家诗作;《唐人诗集》一百五十九卷,收录自唐太宗至权德舆五十家诗,其中许多是辑刊翻刻宋本,即将多种翻刻宋本合编于一册。明仿宋本《唐四家诗》三十二卷,收录王维《摩诘集》、《孟浩然集》、《高适集》、岑参《嘉州集》,“原出于宋,刊刻精雅,尤为善本”,^[18]因其源于宋本,传刻有绪,颇受明人青睐。嘉靖十九年朱警辑刊《唐百家诗》一百七十一卷,收录初唐21家、盛唐10家、中唐27家、晚唐42家,颇具规模。据朱警识语,此刻“杂取宋刻,哀为百家”,因此,“此本人各为集,兼有各家旧序……诸人杂标名字、爵里,义例不一”。^[19]这个文本对后世唐诗研究产生很大影响,明末胡震亨编《唐音统签》、清季振宜辑《唐诗》,均从中参酌取舍。唐人诗集的汇刻较之唐人行集单本独行,体现了当时宗唐风气下唐诗选家不同的审美趣味与理论主张。唐人诗集尤其是翻刻宋本的刊刻,使一部部濒于亡佚宋本化身千万,并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古籍原貌,便利了学者研读,推动了学术发展。

四 文人嗜书、藏书的习尚

江南地区独特的地域环境、浓厚的人文意蕴,为书籍生产、输送、销售提供极大便利,也是促成民间出版勃兴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明代江南地区更形成了全国性的集散中心。胡应麟云:

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闽阖也,临安也……越中刻本亦稀,而其地适当东南之会,文献之衷,三吴七闽,典籍粹焉。吴会金陵擅名

文献,刻本至多,巨册类书,咸会萃焉。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20]

嘉靖、万历时期,刻书重心从官府逐渐转入私家,刻书中心转入新的经济发达地区。谢肇淛云:“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即歙县)、吴兴(即湖州)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21]此外,江南地区号称文献渊薮,历史上有藏书的社会风气,江苏、浙江等地在明代出现了众多的藏书家。清人孙从添说:“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常熟)、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22]

贵远贱近,习以为常,藏书家更是宝爱旧刻,鄙夷新刊。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胪列旧监本、秘阁本、杭本、越本、江西本、吉州本等,而南宋盛行的建本、婺州本却一律不载。迨至明代,风气亦是如此。明代藏书家、目录学家祁承燾从内容和时间上提出藏书须“审轻重”,时间上要遵循先古后今的原则:“购国朝之书十不能当宋之五也,宋之书十不能当唐之三也,唐之也十不能当汉与六朝之二也,汉与六朝之书十不能当三代之一也。”^[23]孙从添《藏书纪要·鉴别》云:“若果南北宋刻本,纸质罗纹不同,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所谓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宋刻本之妙尽之矣。”道出了明清以来人们珍视宋本的普遍原因,以致明代藏书家鉴评当代刻书多从形式、内容方面与宋刻做比较。宋刻本到了明代显得颇为珍贵,竟出现了按叶论价的现象。^[24]因此,明代藏书家因好古而倣宋,由倣宋而翻刻宋本,合情入理,一脉相承。宋本日渐稀少,翻刻宋本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宋本的本来面目,自然赢得文人学士的宝爱,这种社会需求也促动了翻刻宋本的兴盛。

五 明政府严禁窜改旧版文字行格

明王朝政治上实行的高度集权专制,也渗透于雕版印刷行业。明初朱元璋颁行诸多官书,并对这些官书的雕印提出要求。如在《大诰续编》中,有朱元璋关于翻刻《大诰》的御旨:

今特命中书大书重刻颁行,使所在有司就将此本,易于翻刻,免致传写之误。敢有仍前故意差讹,定拿所司提调及刊写者,人各致以重罪。^[24]

明成化四年,山西提学僉事胡谧“请颁《大明一统志》于天下,礼部乞于司礼监关领原本,付福建布政使司,书坊翻行。”^[25]

如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的明弘正间翻刻宋本《李君虞诗集》,正德依宋刊本《皇甫补阙诗》、《皇甫御史诗》、《郎刺史诗》、《章碣诗集》、《张孝标诗集》、《唐张处士诗》,缪荃孙《艺风藏书志》、邵懿行《四库简目标注》等多家书目著录的明正德仿宋刊本《王右丞诗集》,正德间郭勋覆宋本《白乐天文集》、《白乐天诗集》,正德十五年袁表仿宋刊本《皮日休文藪》,正嘉间覆宋本《李翰林集》,嘉靖十九年陈敬学翻刻宋汪纲本《万首唐人绝句》,二十五年秦禾重刊宋本《孟东野诗集》,三十一年董氏茭门别墅翻刻宋乾道本《元氏长庆集》,嘉靖间仿宋本《樊川文集》等。

明政府对重要图书的刻印有严格的管理,主要措施是由政府提供原式,鼓励依样翻刻。有关这一点,清人张芳在《徽州唐宋秘书论略》中有相关记载:

有明之中叶,功令严明,士习统一,坊肆雕本多出礼部颁行。惟王府宦邸时翻刻旧本大书。王府本不传入人间,高参政叔嗣刻行宋郑伯谦《太平经国书》、马太守金刻行齐褚澄《石经》,自非大官校刻,坊贾率不敢妄有刊本。^[26]

出版业极为发达的建宁,明政府的监管措施也非常严格。明正德十二年建宁郡守张文麟言及建宁刻书时说:“近时刻者,专事时文……以此媒利。至于古书,多弃事不省,间有刻《史记》者,君子伟之。近建阳尹邵龠宗周,费至一帙,不觉弃案牍而加检阅,则见其篇章错乱,字句差讹,甚者妄议古典。”有鉴于此,张文麟遂以政令的形式责令当地书坊:

今后书坊以十分为率,八分刊刻古书,二分时文,听府允许,方许誉正,必使部无句差,句无字差,字无画差,然后刷印,播土后学。^[27]

嘉靖间时文刊刻有增无减,流风较前更炽。为此,福建提刑按察使向书坊集中的建宁府发出牒文,要求按官定版样,照式翻印,方许刷卖。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内载牒文,略云:

照得《五经》、《四书》,士子第一切要之书。旧刻颇称善本。近时书坊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狭,字多差讹……议呈巡按察院详允,会督学道选委明经师生,将各书一遵钦颁官本,重复校讎。字画、句读、音释,俱颇明的……为此牒,仰本府著落当该官吏,即将发出各书,转发建阳县,拘各刻书匠户到官,每给一部,严督务要照式翻刻。县仍选委师生对同,方许刷卖。书尾就刻匠户姓名查考,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自改刊。如有违谬,拿问重罪,追版铲毁,决不轻贷!^[28]

建宁府辖的建阳自宋以来即是书籍刻售中心,此牒文由于是政府出面严厉禁止刻书形制上窜改旧式,自然对其它地区的家刻、坊刻主及其刻工有警示、威慑作用,这从政策层面助长了当时翻雕古籍所形成的照式翻刻,甚至连版心刻工姓名、每页字数全部摹刻下来的版刻风气。皇帝和地方司法、教育机构如此严格地控制刻书款制,自然容易形成一体化的版式风格,这也是翻刻宋本大量、集中产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参考文献:

- [1] 黄佐.眉轩存稿序[A].泰泉集:卷三十丑[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73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99.
- [2] 都穆.潜夫论[A].冯惠民,李万健等.明代书目题跋丛刊:

下册[Z].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2010-2011.

- [3] 都穆.申鉴[A].冯惠民,李万健等.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下册[Z].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2010.
- [4] 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Z].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93:43.
- [5] 胡广.明太祖实录:卷四六[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逊志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5:1512.
- [7][15] 李梦阳.空同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569.
- [8] 王仲镛.升庵诗话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28.
- [9] 王锜.寓圃杂记:卷丑[M].中华书局,1984:42.
- [10][11][12][14]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4826,5014,5301,7381.
- [13] 崔铣.漫记[A].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洵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1500.
- [16] 凌稚隆辑校.史记评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29.
- [17] 安平秋.史记版本述要[J].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1):19.
- [18] 刘承幹.嘉业堂藏书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120.
- [19]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九[M].北京:中华书局,1995:898-899.
- [20]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2001:79.
- [21]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M].上海:上海书店,2001.
- [22] 孙从添.藏书纪要[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2:12.
- [23] 祁承燾.澹生堂藏书约·鉴书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24] 大诰续编:八十七[A].张德信,毛佩琦.洪武御制全书[Z].合肥:黄山书社,1995:267.
- [25][26] 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401.
- [27] 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Z].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93:43.
- [28]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99:192.

作者简介:杨军(1965-),男,陕西千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新闻出版研究所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代图书出版与社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编辑出版史、古典文献学。